

## 師門六年記：1977-1983

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9年2月，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，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，題目是「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」。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，成為以爲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「內在理路」的典範，影響極為深遠。而我當時猶忝列「批余小將」，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，聽了這個講演，心中若有所失。

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，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。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。1976年，我到美國匹茲堡，還沒有註冊，聽紐約的同學說，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，這個人恰巧就是我。之前，申請哈佛的研究計劃，

寫得有些不搭調，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，所以沒被錄取。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，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，我在台下聆聽，卻不明就裏。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，我打過去，余先生說：「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，就過來波士頓玩玩。」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，先抵紐約，再轉去波士頓。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，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。

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大放厥詞。現在回想那次談話，不禁會臉紅：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。余先生跟我半聊天、半面試時，我放言：「讀陳寅恪的東西，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，常是先有引文，才有自己的觀點。這引文裏的資訊ABCD非常多，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，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，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。」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，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，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。但余先生十分包容，聊了三個多小

時後說：「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！」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，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，不禁喜形於色，難掩內心的興奮。

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，老實供出實情。許先生說：「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、學術史，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。」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裏，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，了解他的學問，也有不少收穫。

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，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，一時無法親炙教誨。

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，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。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，無法早起，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；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。而到了哈佛大學，早上五、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，醒來便士氣昂揚，想直奔課堂，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。<sup>1</sup>又性喜逛書

---

1 當時哈佛人文薈萃的盛況，容可參閱吳詠慧，《哈佛瑣記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事業公司，1986；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）。

店，嗜書如癡，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，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，就說：「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，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，準把你壓死。」

初始，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，後來起了變化，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——史華慈 (Benjamin I. Schwartz, 1916–1999)。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，有一次他跟我聊天：「你有這樣的底子，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，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，將來恐難脫穎而出。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？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，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，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？」當時聽了有些洩氣，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。後來心情沉澱之後，也覺得不無道理。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，方才定案。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，並沒有正式教過我，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 (1914–1990) 教授。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

最後一堂。第二堂去的時候，教室空無一人，我覺得奇怪，怎麼請假也不講。後來從系裏知道，那時他的精神不佳。

史華慈先生說：「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，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，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。」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，我則喜出望外，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。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。之後，我每隔兩、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、兩晚。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。我和同學康樂（1950–2007）兩個人一起去，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、四點。因為聊得太晚，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鋪，醒來再聊，下午才走。

康樂原本就讀耶魯，為人熱情而有理想，對政治獨有見解，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。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。余先生在耶魯時，恰值創造力的高峰，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。每回一有新作，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，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。有時



余英時老師與作者（攝於1991年10月28日）

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，我充當主要批評者，雞蛋裏挑骨頭。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，耶魯和哈佛，常常來來去去。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，生活也幫了很多忙。我們在高談闊論時，師母便忙著做飯、準備晚餐與宵夜。師母對我們很體貼，很照顧，我內心由衷地感激。